

# 略说语文学、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

■ 沈卫荣

19世纪，诞生了超越古典语文学的德国古典学研究范式：在以语言和文献研究为主的古典语文学之上，增加了古代历史研究和古典考古学二项新的学术内容。当年傅斯年先生所用心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便是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

子曰：“必也正名乎！”近年来，笔者一直尝试着要为语文学(Philology)正名，努力想要说清楚何谓语文学，如何语文学？还曾主持编译过一部《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的教材，但至今依然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面临的首要困难还是怎样才能给Philology正名，为它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名称。以前有“语言学”“语言学”“古文字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文学”，甚至“小学”“朴学”等众多名称，都被前贤们用来对译Philology，这给今人捉摸、理解语文学造成了莫大的困惑。例如，傅斯年先生曾将他理想化地设计的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定中文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可是，长期以来后人并不很明白他当年所用心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到底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还是历史语言学研究，很少有人会想到他所说的历史语言研究其实是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

## 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的“中国古典学”

根本说来，语文学是一门从事文本或者文献研究的学问。文献学可与语文学中的textual studies或者textual criticism, Quellenforschung等分支学科相应。但是，语文学，特别是在弗里德里希·沃尔夫(1759—1824)以后，其研究范畴远远超越文献学，它不但包括语言学、历史学的内容，而且还包括文学、哲学、民俗学、古文字学和考

古学等研究领域，最终形成超越了古典语文学的德国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

于19世纪的德国学界，语文学曾被划分为“词之语文学”(Wortphilologie)和“物之语文学”(Sachphilologie)两大类，“文献学”或可与“词之语文学”，或者“文本语文学”相应，但它通常不包括“物之语文学”的内容，后者还包含古物学、考古学、碑铭学和古文字学等许多不属于文献学所研究的内容。不得不说，坚持用语文学或者文献学来翻译、指称语文学，表达的或更是一种个人的学术情怀，但其实际效果却是对语文学的一种限制和矮化。

近十余年来，“古典学”于国内多所著名高校内兴起，生机勃勃，它不但不是中国人文学界一个异军突起的新领域，也是高校为强调人文学术基础和博雅教育而上演的一场重头戏。起初，古典学的兴起主要是出于对西方古典学及其研究对象西方古典文明和思想的推崇，尝试要把对西方古典文明的学习和研究，作为中国高等院校的人文学术和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引进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中；而晚近几年，中国学界对古典学的重视更多表现为对“中国古典学”的热情倡导，要将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校园内层出不穷的“国学”研究，借助西方古典学的既定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进行学科上的整合、改造和创新，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语文学。这样的努力无疑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申报的“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并进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令人疑惑的是，眼下虽然人人争说“古典学”，可每个人都对古典学有着自己的定义和理解，大家似乎都做着不一样的古典学。显然，与语文学一样，古典学也是亟需“必也正名乎”的一个概念。一个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事实是，所谓古典学其实就是语文学。

## 傅斯年所说的“两种古典语文学”

西方古典学这个名称或是直接从英语的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翻译而来，可在欧洲近代学术史上本来并没有这样一个学科。其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在北美大学中兴起的，可与之相对应的学科，于欧陆的传统中应



◀ 1938年10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躲避日机空袭，迁昆明龙泉镇。图为用作善本书室的龙头村宝台山观音殿。 资料图片

当就是“语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

最近，德国近代语文学大师维拉莫维兹(1848—1931)一部经典著作之汉译的修订本出版，标题作《古典学的历史》，而其封面右侧标志的德文原标题却是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译作《语文学史》，显然，于此译者对“古典学”和“语文学”不加区别，这也可说是受了英译本标题的影响。维拉莫维兹的《语文学史》最初出版于1921年，到了1982年才被译成英文出版，题为《古典学学术史》。与此类似，德国古典语文学家鲁道夫·普法伊费尔(一译法文，1889—1979)的大作《古典学学术史(上卷)：自肇端诸源至希腊化时代末》(1968)，其德文版标题也是《古典语文学史》(1970)。无疑，当下被人们习惯称为古典学家的维拉莫维兹和普法伊费尔，本来都是古典语文学家，他们的著作讨论的都是古典语文学的历史。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尼采曾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可当下他也被人称为“一名古典学家”。2014年，德国学者编集、出版了一本讨论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尼采的语文学水准、方法和成就的论文集，其英文标题就是Nietzsche as a Scholar of Antiquity(《作为一名古典学家的尼采》)，而这本论文的译者则把它译作《尼采作为古代史学者》。其实，这本书中的Antiquity指的是西方的“古典”，与德文的Antike，或者Altertum相应，“作为一名古典学家的尼采”对应的应该是“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尼采”，所以，英文中的“古典的学者”

对应的或是德文中的“ein klassischer Philologe”，或者直接是“ein Altertumswissenschaftler”。这个例子表明，不只是中国学者，就是德国学者，眼下亦都无意无意地将“古典语文学”与“古典学”和“古典学术”等而视之了。

古典学原本是一门从事对西方古典时代之二种古典语言，亦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古代文明之经典文本[文献]研究的学问。傅斯年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响了两种古典语以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他说的“两种古典语”便是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它们在欧洲近代新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形成之后，也曾被称为“旧古典语文学”(Altclassische Philologie)，其研究对象大致是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内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文献。

古典语文学主要是一种文本语文学研究，它从研究语言、文献着手，进而研究其历史、文化、宗教和思想等古代文明，它当然可以被看作是古典学研究的。但是，如前所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典学”更接近的一个学科名称应该是德国古典语文学传统中出现的“Altertumswissenschaft”，或“Altertumskunde”，译言：古典学。这是沃尔夫首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在以语言和文献研究为主的古典语文学之上，增加了古代历史研究和古典考古学二项新的学术内容，使古典学的研究不只是书面的语言文化研究，而且还是物质的文化和文明研究。

文汇报  
学人

第587期



◀ 1938年10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躲避日机空袭，迁昆明龙泉镇。图为用作善本书室的龙头村宝台山观音殿。 资料图片

## 把专业性、学术性和科学性放在第一位

长期以来，世界学术传统中的古典学研究一直以西方古典学为主导，它是研究西方古典时代文明的一门学问，这标志着欧洲中心主义对于世界学术的持久和重大的影响。近十余年来，西方世界，特别是北美学术界，已开始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学术传统进行严肃的反思和批判，一些重点大学甚至已经将古典学排除在主修学科之外，或者将古典学改造为“古希腊罗马研究”“地中海研究”一类的学科，减弱其作为古典学学术的特殊地位。与此同时，古希腊、罗马文明之外的其他地区或民族、族群的古典文明的研究，则开始被纳入古典学研究的范畴。作为一个全新学科建制的中国古典学正是在这股世界性的学术变革大潮中开始出现的，并于近十年间与西方古典学一起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然而，与对西方古典学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一样，我们今天对中国古典学的理解则更加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有人用心将中国古典学解释和建构为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亦有人将中国古典学作为对中国古典学的基础，多年前有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新语文学的说法；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潮流是将整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理解为中国古典学；还

有人主张将对古代汉语文经典和思想的研究作为中国古典学之核心，或者延续中国的“国学”传统，将对中国古代思想、经学研究作为中国古典学的核心等等。

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首先是对中国古代语言、文献[经典]的语文学研究。这样的中国古典学与早期的西方汉学(Sinologie, Sinoologie)有很明显的共同之处，有人甚至直接将汉学称为“汉学语文学”(Sinological Philology)。虽然汉学现已被中国研究取代，失去了其学术权威意义，并已经在北美的学术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但汉学一定是中国古典学必须继承和创新的学术传统。

事实上，与西方之东方学研究的其它分支学科一样，汉学也是一种典型的“民族语文学”学科。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兴起，诸如日耳曼语文学、罗曼语文学、芬兰语文学、伊斯兰语文学等民族语文学纷纷兴起，它们通常被称为“新古典语文学”或“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包括了古代历史和古典语文学的德国“古典学”也曾被称为“古典古典学”(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nschaft)，这或是表明一种包括德意志古代历史和考古研究在内的民族语文学，要算是“新古典学”了。与此相应，我们自己的古典学既可以是一种纯粹的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式的语文学，也可以是一种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和考古学在内的，同时包括书面语文学和物质文明研究的“中国古典学”研究。傅斯年当年倡导历史语言研究，以此来实现中国人文学的现代化，他借用的范式就是这种德国式的“古典学”。

2002年，著名古典语文学家格·莫斯特主编了一本讨论语文学历史和古典语文学性的论文集，题为《学科化古典学》(Disciplining Classics)，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本论文集的德文标题是Altertumswissenschaft als Beruf，译言《作为职业的古典学》。莫斯特不但将英文中的Classics与德文中的Altertumswissenschaft完全等同了起来，而且明确表明“古典学”与欧洲其他人文科学学科一样，必须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的科学，而不是预言家和先知们擅长的宣传和说教。所以，不管是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还是倡导和建设中国古典学，我们都必须把古典学“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把它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科学性放在第一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林

## 现代历史学的诞生

19世纪的学科界分与交互

■ 张红霞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革命促进德意志帝国巨大的物质发展，技术革新和工业发展对实际功用不甚明显的人文科学形成了巨大挑战。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之下，对历史学的正名便尤为必要。历史学从业者开始全面思考历史学科的专业化进程。历史学者的学术化、从业者和机构的制度化进程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德意志的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就“历史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耗时二十余年，经由多次修订教学讲义，著成《历史知识论》这一指导性手册。这段为“Historik”正名的引文，折射出这位19世纪德国学者对历史学的整体性思考：

“历史知识论不是历史科学百科全书，不是历史哲学(神学)，不是道德世界的物理学，更不是历史写作的诗学。历史的任务是作为历史思考和研究的有机体。”

德意志从不同的维度对Historik进行了系统性定义。他眼中的Historik正如泰勒斯眼中的水、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勒特的火、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恩培多克勒的水火土气、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信而存在的本体，是有机统一体。而在与他者进行区分之时，他又取用了历史知识论的某个具体层面——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历史学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百科全书理念；从方法论的角度，又与玄思的哲学(神学)、运用定律解释自然现象的物理学(自然科学)比较；在历史叙述方面，又与诗学进行了区分。

“百科全书”是旨在以系统或字母顺序全面总结整个知识体系或特定领域的知识汇编作品。文艺复兴以来，人们不满足于中世纪积累的抽象知识，转而从古典文献中寻找本质和方法，拉丁语文库(1536)和希腊语文库(1575)字典的编撰就是一例。两部字典共同奠定了按字母顺序排序的字典编纂范式。这一进程也体现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发生变化：由抽象道理转为对文本的考证。

随着17世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的盛行，百科全书的主题也从早期的宗教、古代知识转向以实用、世俗为特征的现代话题，如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共同主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系统性词典(1751—1777)。

百科全书理念在古代史学界也有体现。1837年由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保利创办的Realencyklopädie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丛书(《古典古代通学百科全书》，后简称RE)即是典型。我们从书名中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百科全书，而是具有明显学科特征的“真”(real)百科全书。扎实的学术立场和具体条目的编辑方式，已然超越了早期那种知识的“彻底的全通”。该丛书创办的初衷在于为专业从业者提供参考书。1864年之后，在托伊费尔的领导下不断扩大，成为一本更广泛且全面的古代知识百科全书。

历史学界对这一思潮的反应是多个层面的。从课程名称的设定中，就可看出端倪：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将课程命名为“百科全书式的语文学”，奥古斯特·伯克将课程命名为“古典语文学的百科全书与方法论”。而德意志将这种对知识的整理传统与历史学进行了区分，明确指出堆砌知识的百科全书理念不同于历史学的样态。换言之，百科全书强调知识的集腋，是知识编辑的样态，而历史学强调学科性、强调历史方法论与整体性。

德意志又将历史学与哲学(神学)、自然科学作了区分。将这三门学科并列，同样耐人寻味：这在学科/学术史上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他指出哲学(神学)、物理学、历史学理解世界的方法分别对应特定的科学方法：玄思方法、物理方法、历史方法；分别依托逻辑、物理、伦理工具；最终分别以这些具体的认知路径——去找寻、解释、理解——来达成认识世界的目的。哲学与神学，因共用玄思方法而被德意志划为一个范畴。两者均追寻世界本原问题，采用溯源的思维方式。

在19世纪德国，以复古求振兴的人文主义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即回溯源头。对来源的追溯和对(古代)源头的充分理解，恰恰促成了理解、编辑和解释古代文本的理性方法的发展。德意志的“史料解释与史料考证”一样，不是在找寻事情的开端，即指历史学与哲学(神学)追求(如探寻幸福、真理等的本质)的方法有别，也是与文艺复兴时期惯用方法的一种区分。

回溯源头的路径催生了当时德国学术界一种盛行的研究方法，称为Quellenforschung，指对传世文献来源的审查。而学者们将对历时过程的结果解释转向对共时结构的文学阐释的方法，又激发了怀疑论。

自然科学跳出于哲学，早期的自然科学研究往往被称为“自然哲学”。直至启蒙运动时期，科学与哲学、神学才逐渐分离，进而于19世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方法论。德意志这里所称的Physik，为广义研究物质世界的学科，而非狭义的物理学学科。起源于伽利略、牛顿时代的这门实验科学，在19世纪已有众多分支，它们共有的重实验、求确证的方法已然在历史等人文科学产生影响。尤其在史学史领域，如以兰克为代表的强调史料批判、在叙述上要求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史学，以休谟、孔德为代表的强调确定事实、发现规律的实证主义史学，黑格尔的明确的四阶段历史发展观、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与历史的个体性的统一等等，都与之有关。

而德意志认为，自然科学用特定定律解释同类现象，并以此说明二者的因果关系，这并不适用于解读道德世界发生的历史。

在德意志的时代，“科学”这一强调实证的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的典型代表，当属英国人巴克尔。他于1861年发表两卷本《英国文明史》，被后人视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宣言。巴克尔称：“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说明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都是有规律的，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来阐明这种规律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德意志则认为，“巴克尔不是因此将历史提升为一门科学，而是将

其置于自然科学的圈子里”。相反，他已经有历史本体的认识：“历史研究在当代精神活动中占据一定份额，它积极发现新事物，再探已经流传的事物，以适当的方式呈现新发现。”相比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从个体的悟性、个人的归纳总结走向普遍适用，是一个充满分析的过程。德意志反对对绝对因果关系，甚至是用一种普遍的定律来解释所有个例。

“历史研究不是说明的工作，不是解说前事如何决定后事……就好比永恒物质和物质变化的类似物。”

德意志的这番话是对历史解释思维的一种规范。此时，强调Physik的实体物质性，确已催生了历史研究方法的转向。比如，在德国，因为追求古代生活表现形式的“客观”研究，而掀起了古物研究热。这一倾向在耶格尔发起的第三次人文学运动中更为明显，也极具争议；再如伯克的Sachphilologie(“实物文献学”或“物之语文学”)。

除了正面指出历史学与物理学的不同，德意志特别强调人类世界的道德性。如果道德世界是实验方式构造的，那依照固定的数值就可以复制到同种结果。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活生生的、生活在道德世界的人，就无需自由、责任和道德约束。

德意志脑海中的历史是一个如同人体一般，强调感官认知、意识建构的世界。因此，即使今人谈古人，古人的过去也映射在今人心里。正是这种感官、意识建构的道德世界，让同为人类的研究者一定程度上与古人实现一种共情。而正是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天然差异，让研究者能“各显神通”，使用各自的方法。历史学的理解方式需凭借一定的直觉，好像一个心灵捕手，去理解过去。这个过程及其创造的结果，如同交配及受孕一样具有创造性。如德意志所说：“解释的本质是在过去的事件中看到真实，以及促成这种现实和现实本身的所有充分条件。”而究竟看到什么，便是道德世界的丰富性、研究者的个性所决定的。

事关“输出”，德意志还将历史学与诗学这种带有审美和文艺风格的书写方式进行了区分。

历史研究具有科学的主张、系统的方法，历史书写(Geschichtsschreibung)则被定义为历史知识的话语中介。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始于古希腊，不同于早先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波斯人等古代民族对统治者进行赞颂的叙述方式。现代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在对文本的批评过程中，尝试捕捉陈述的意图及其可信度，而德意志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史学理念形成的时代。

古典学家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作家和修辞师。德意志在19世纪即已注意到诗学写作与历史书写的差异，他就不同的学术命题，列出疑问式倾向、叙述倾向、教学论倾向、基于话语模式的讨论倾向等书写方式。至此，德意志向读者交代了他对Historik的宏大认识体系。读者可以从中看到19世纪历史学人思维的系统性，及明显不同于学科细分之后的工匠一般的思想——只有零散的知识、碎片化的经验和认识，难成体系。当然，不能忽略的是，学科在建制上的成功促成了学科的传承。而德意志这一集方法论、系统性为一体的Historik作为教学论也在学院得以传承，历史研究的演进也终于脱离了对于研究者个人禀赋和技巧的依赖。这种系统性思维对当下历史研究从业者，意义重大。

19世纪的历史学者对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路径极其谨慎。今天，尽管所处时代不同，需要回答的学术问题和历史学科的不同，如何在学科交叉之中保持历史学科的本色，仍是值得每一位历史学从业者思考的。保持历史学科的本质，重要的是研究问题的提出。计算机科学可以成为帮助回答历史问题的一种方法，但不可取代问题的提出——这或许就是AI不可取代历史研究者的地方。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德意志(1808—1884)